

魯迅新傳(一)

● 周 谷

新文學界漸露頭角

思想左傾地下工作

魯迅以巴人筆名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四日至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在北京「晨報副鐫」上註①的「開心話」、「新文藝」和「文藝」欄內，連續刊登以他的家鄉浙江紹興一個小鎮小村的社會景象，以及這個小鎮小村人民的一些生活習俗為背景，而寫成的非農民形象的「阿Q正傳」成名後，在民初北京新文學界漸露頭角，特別受到學校青年、社會青年的尊敬和愛慕。魯迅便因此而迅速捲入那一個時代自動自發的新舊思想衝突和新舊思想融合的論爭。魯迅在這些論爭中，漸被製造成後來的新文學界的旗手。從此以後，中共黨外的魯迅在中共黨內的文學聲譽，一天高似一天，從而他的為人作事，為文倡義，也普遍受到中共有目的的推崇和膜拜，浸至成爲中共黨內的黨外最具權威的文藝、政治理論家。魯迅的名著發表時，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三個留日學生(李達、李漢俊、周佛海)、三個大學生(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兩個中學教員(董必武、陳潭秋)、兩個中學生(王燼美、鄧恩銘)、一個小學校長(毛澤東)、一個剛失業的社會教育工作者(何叔衡)——在上海秘密建黨尚不及半年。

魯迅本名周樟壽號豫山，後易名豫才，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誕生於浙江省紹興縣一個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二弟樾壽號作人，三弟松壽號建人，四弟椿壽六歲夭折，妹瑞姑幼殤。魯迅爲一九一八年四月二日寫「狂人日記」開始使用的筆名。魯迅一八九八年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再易名周樹人。第二年改讀江南陸師學堂附設之鐵路礦務學堂。一九〇二年前往日本遊學，先學語文，二年後始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後棄醫在東京自修文學。一九〇六年六月六日魯迅奉母命自日本回國，與一八七八年出生於山陰丁家弄的朱安結婚，婚後三天便重回日本，一九〇九年八月再回國任教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後返鄉辦教育。

南京成立，孫中山被舉爲開國大總統，任命蔡元培爲教育總長。魯迅好友許壽裳、蔣維喬被蔡元培延攬入部從事法規創制工作。魯迅受許壽裳的推薦，遂自原籍前往南京任教育部部員新職。二月十三日，孫大總統禪讓舉袁世凱自代，袁於二月六日就任後移都北京。四月二日政府北遷後，魯迅與許壽裳於五月初隨政府北上，不久改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員，同年八月升任部中薦任僉事，並任社教司第一科科長。魯迅從此定居北京過着亦官亦士的優閒生活。其間除在教育部任職外，同時並在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私立中國大學、私立黎明中學兼課。國立北京大學於一九二〇年八月二日聘魯迅爲小說史料講師，講授「中國小說史」，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開始上課。在北京居住期間，魯迅與他母親魯瑞(一八五八—一九四三)送給他的「禮品」朱安夫人同住。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爆發「三一八」慘案，魯迅於六月二十九日始倉皇與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許廣平小姐避難南下，才離開他兼職六年的北京大學，初至廈門繼轉廣州，許廣平則直接先回廣州。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於一九一二年元月三日在

次年四月中國國民黨武力清黨，魯迅亦受波及，年底他與許小姐自廣州轉往上海，迄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病逝，魯迅不曾離開上海。凡聞其名讀其書的人，多爲他盛年凋謝感到惋惜。

魯迅在日本學醫時，也曾留心日本當時有關社會主義新思想的東西。一九〇五年魯迅因認識中國同盟會日本全權委員宮崎寅藏，而接觸到日本出版的「社會主義研究」叢書五冊，開始知道世界上有社會主義這個東西。

俄國的十月革命，特別對遠東常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影響極大。這些受壓迫的國家開始注意俄國的動向，當時中國的一些知識青年頗嚮往俄國推行的勞農制度，以及他所奉行的馬克思主義，以爲這就是新世界的開始。中國的學術界、文學界也紛紛爲文介紹這個伴打着馬克思主義旗號的新型極權專制國家。

在魯迅的作品中，最早提到列寧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是他一九一九年四、五月之間所寫的「隨感錄五十六『來了』」和「隨感錄五十九『聖武』」兩篇短雜文。魯迅在「來了」短文中說，不用怕什麼「過激主義來了」。那時國人對馬克思主義還很陌生，把他們一律叫做過激主義。北洋政府還下令要對此嚴查，「有無過激黨設立機關」之事。魯迅又在此文中說：「所以無論什麼主義，全擾亂不了中國；從古到今的擾亂，也不聽說因爲什麼主義。」如此，魯迅也應該自然認識到，後來那些人在中國以武裝搞不適合國情、照抄照搬外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也應該「全擾亂不了中國」。

魯迅也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一些影響，一九三四年他在「答國際文學社問」時還說：「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產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魯迅讀了俄國詩人勃洛克的俄國十月革命長詩「十二個」（此詩係胡敦譯，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京新書局出版），於一九二六年七月寫了「『十二個』後記」。魯迅說：「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算不得一個大風暴；到十月才是一個大風暴，怒吼着，震蕩着，枯朽的都拉雜崩壞，連樂師畫家都茫然失措，詩人也沉默了。」魯迅對俄國十月革命的認識，只是一點感嘆，並未清楚認識到這場革命究竟意味着什麼，究竟對俄國人，究竟對全世界有什麼重大的影響。在北京的中國文化人也受到了俄國十月革命一些影響。

北京「新青年」雜誌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出過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同年北京「晨報」副刊開闢了「馬克思研究」專欄，陸續譯登一些俄國十月革命標榜的馬克思的一些著作。北京「晨報」與上海「時事新報」並且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開共同發表啓事，「特合籌經費遴派專員，分派歐美各國，擔任調查通訊事宜，冀稍盡吾儕之天職，以開新聞界之一新紀元焉。」繼即遣派美、英、法、德、俄五國特派員計八人分別前往。兩報所派俄國特派員爲瞿秋白、俞瀟廬（俞頌華）、李續忠（李宗武）三人。魯迅這時身居北京，自然會接觸到這三位特派員所報導的「過激主義」（馬克思主義）、「窮黨」（布爾什

維克黨）、「餓鄉」（蘇俄）的實際情形。魯迅的「阿Q正傳」就是在「晨報副鐫」上發表的，對「晨報」不會不留意。

一九二〇年魯迅在「新潮」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說過：「現在偏要發議論，而且講科學，講科學而仍發議論，庶幾乎他們依然不得安穩，他們也可告無罪於天下了。」陳望道對此深表贊同，所以他於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特地把自己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寄贈魯迅一本。這本小冊子屬於一九二〇年五月「新青年」出版的「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魯迅接到書後，當天就翻閱了一遍，並且贊揚說：「現在大家都議論什麼『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開了一陣之後，這次埋頭苦幹，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註②魯迅在日本時已曾接觸過日譯本「共產黨宣言」及一九〇六年中國國民黨朱執信以鑿伸筆名在日本翻譯的「共產黨宣言」。

魯迅於一九二四年還購閱了「馬克思主義與法理學」、「托爾斯泰與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文化」。一九二五年又購閱「俄國現代思潮和文學」、「新俄美術大觀」，年底又閱讀了「國民新報」副刊上選載的列寧著作「國家與革命」來試圖了解俄國和俄國的十月革命。抱朴（原名秦惠生又名秦濂清）於一九二〇年冬天以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身份與另一團員廖化平偷越東北國境，遠赴莫斯科入東方大學求學。抱朴一九二四年回國後在北京「晨報」及上海「時事新報

「發表有關留俄生活的文字。他的「赤俄遊記」得到魯迅賞識並推薦給上海北新書店出版。註③魯迅對赤俄的思想動向已非常注意。

一九二七年元月魯迅到廣州任教，於當年四月十日寫成「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同年五月五日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出路」第十一號曾予發表。這篇一千五百字的雜文，不僅四次提到列寧，而且轉引了列寧的整段論述。此文「人民日報」曾於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予以全文轉載。魯迅在文中所引是錄自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共青團廣東區委機關報「少年先鋒」第一卷第八期所刊，斯大林一九二四年元月八日在克里姆林軍校學員晚會上的演說——「論列寧」——，所引列寧的一段話即：「第一要事是，不——，所引列寧的一段話即：「第一要事是，不因勝利而使腦筋昏亂，自高自滿；第二要事是，要鞏固我們的勝利，使他長久屬於我們的；第三要事是，準備消滅敵人，因為現在敵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滅程度還遠得很。」一九二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論列寧」是重譯的，只文字略有變動。魯迅因而感到「俄國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寧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歷來革命成敗的原因，自己又積有許多經驗，是說不出來的。先前，中國革命者的屢屢挫折，我以為就因為忽略了這一點。小有勝利，便陶醉在凱歌中，肌肉鬆懈，忘却追擊了，於是敵人便又乘隙而起。」其實俄國算不得什麼革命世家，列寧也不是什麼革命的老手。中國歷史上的湯武革命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深遠影響，陳勝、吳廣更是中國農民革命的資深老手，列寧只不過是用暴力鎮

壓屠戮國人異己，獲得成功的一位暴力革命老手典型而已。

特別是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間，魯迅受到來自中共在上海的黨員最強大最猛烈的圍剿，迫使魯迅買了很多有關馬列和蘇俄文學的書籍，來充實自己倉卒應戰。一九二八年春，魯迅寫信給他原在北京大學的學生任國楨求救。魯迅說，現在在上海有些人正對他圍攻，滿紙用一些頗不易懂的、革命的新名詞嚇唬人。因為他們的圍攻，他想找些關於馬列的文藝論述看看，從理論上加深認識，也好應付圍攻的人。他說他知道任國楨是學俄文的，又譯過「蘇俄文藝論戰」，也知道任國楨在從事地下工作。因此，希望任介紹一些書，或將其中部份書名告訴他就可以了，他有些辦法可以買到。任國楨輾轉收到魯迅的來信後，便與當時在哈爾濱為中共做地下工作的楚圖南商量。他們一同來找哈爾濱蘇俄中東鐵路圖書館館長，俄國殘廢軍人替托夫，一起商量了一個中文、英文、俄文的書目寄給魯迅。後來魯迅翻譯了幾部文藝理論書，其中有些就是任國楨他們提供的。註④

魯迅經過圍攻圍剿的教訓，先後買了很多有關馬列的新書：「俄羅斯文學理想與現實」、「文學與革命」、「無產階級藝術論」、「無產者文化論」、「新俄文學之曙光期」、「什麼是階級意識」、「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聯共(布)黨史」、「論中國革命問題」、「唯物論與辯證法之根本概念」、「辯證法及其方法」、「唯物的歷史理論」、「辯證的唯物論入門」、

「馬克思之辯證法」、「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社會主義及社會運動」、「婚姻及家族之發展過程」、「唯物史觀解釋」、「現階段的中國革命」及「俄羅斯社會史」等書。

這些書除極少數是中文本外，其餘大多數是日本著作，魯迅多數買自上海日人內山完造開設的內山書店。魯迅爲了存放這些馬列書籍，曾托內山給他代租一個房子。魯迅就利用內山以內山名義租賃的房子，存放馬列書籍，但並不在此看書。一九二六年六月魯迅創辦了「奔流」月刊雜誌，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翻譯馬列的文藝理論。這個刊物曾發表了魯迅譯述的「蘇俄的文藝政策」多篇。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起，魯迅開始爲許廣平女士講解「馬克思讀本」，每日一、二頁，此係一九二八年四月日本東京資文堂書店新出版，分十段介紹馬克思及其思想的書。這種夫唱婦隨的讀書生活，一直持續到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日，歷時五個多月。事實上，魯迅的研究，也只用這些東西來以牙還牙嚇唬對方，他自己並不會加以深刻的研究與分析。

由於魯迅嚮往俄國十月革命表面上的成就，加之他喜愛文學，乃開始大量向國人翻譯介紹蘇俄小說。一九二八年魯迅已自己開始計劃編譯「蘇俄作家二十人集」，排版、查禁、印刷的多種原因，遲至一九三七年二月才出版。出版時已易名「蘇聯作家二十人集」，此項易名魯迅生前已經同意。此書列爲上海良友公司「良友文學叢書」。魯迅翻譯的「藝術論」有兩種。一爲盧那卡爾斯基所著，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上海大江

書舖出版。另外一本為蒲力汗諾夫著。一九三〇年七月上海光華書局出版，是魯迅主持，馮雪峯發動的「科學的藝術論叢書」的第一本。當開譯之時，有人譏魯迅為「投降」，作「貳臣」，「拿着蘇聯的虛布」，後來又被作為魯迅「方向轉換」的證據。魯迅在他的「二心集」中「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說：「譯一本關於無產文學的書，是不足以證明方向的，倘有曲譯，倒反足以為害。」多譯幾本總可以證明方向，魯迅譯的書已不少啦。

魯迅的最後十年，費了許多心血翻譯和介紹多種蘇聯小說：雅各武萊夫的「十月」，高爾基的「俄羅斯的童話」，果戈里的「死靈魂」，綏拉非摩維支的「鐵流」，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伊凡諾夫的「鐵甲列車」，富爾曼諾夫等的兩本短篇小說集。魯迅於一九三〇年底又重譯蘇聯作家法捷耶夫（一九〇一—一九五六）一九二七年所著小說「毀滅」，一九三一年發表時題作「潰滅」，著者署A.法兌耶夫。毛澤東於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還說：「法捷耶夫的『毀滅』，只寫了一支很小的游擊隊，它並沒有想去投合舊世界讀者的口味，但是却產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國像大家所知道的，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毛澤東看到的「毀滅」正是魯迅所譯的。魯迅譯「毀滅」等書用「三閑書屋」空名出版，不能公開發售，便託由上海日商內山書店從櫃台下賣出去。法捷耶夫一九四九年九月奉斯大林之命，率領蘇聯文化代表團參加中共十月

慶典。會後由曹靖華陪同赴天津的參加慶祝大會，法捷耶夫在談話中表示感謝魯迅翻譯他的「毀滅」，使他感到莫大的光榮。

經發現魯迅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間，與蘇聯文藝團體及蘇聯朋友偶有通信，多為推崇蘇聯文藝作品的成就。這些信均託由魯迅的朋友俄文通曹靖華譯為俄文發出註⑤。據不完全的統計，魯迅一共翻譯介紹了俄國、蘇聯、日本、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荷蘭、西班牙、芬蘭、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十四個國家，將近一百多位作家的兩百多種作品，印成了三十三個單行本，總字數超過二百五十多萬字。其中俄國和蘇聯的作品又占一半以上。翻譯作品的類別分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劇本、童話、和文藝理論著作註⑥。魯迅的翻譯作品除選譯自日文外，其餘外國文字的作品多是從日文本再轉譯的。

魯迅的思想特別是自一九二八年被上海文化界圍剿後，逐漸自傳統的中國文化思想向左轉，終於不知不覺成爲中共在上海的文化前敵總指揮大元帥，地下工作的大功臣。

三重性格遭到圍剿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爆發了「三一八」慘案。北京政府執政段祺瑞就在這一天，竟下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等，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羣衆，屢肇事端，……徐謙等並着京外一體嚴拿，盡法懲辦，用儆效尤。切切此令。」並令軍警殺傷了一些正在北京

向國務院請願的大、中學生，在京畿的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的要人，以及一部份文化界人士吳敬恆、蔣夢麟、周樹人（魯迅）等四十五人均在通緝之中。魯迅名列金榜後，爲避免無謂災難便於四月十五日下午避入日本人在北京所辦之山本醫院，當晚復移往一家德國醫院，二十三日離開德國醫院回家，二十六日謠言紛起，魯迅又避入法國醫院，到五月初才敢回家，魯迅受此血淋淋的教訓，精神上無限悵惘，覺得長安居大不易；有意他遷，擬避難南方。當時南中國充滿了蓬勃的革命新氣氛。

魯迅於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自北京南下上海。次日即應他在上海的老朋友沈雁冰、朱自清等人的歡宴後，隨即乘船離開上海於同年九月四日到了福建廈門。因爲魯迅的朋友林語堂時任廈門私立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介紹了魯迅、孫伏園、顧頡剛、沈兼士、陳萬里、張星烺、潘家珣到廈門大學文科及國學研究院任教。魯迅在廈大教「中國文學史」「中國小說史」等課程。魯迅不滿廈大的作風，因爲廈大理學院長劉樹杞兼長總務，三遷魯迅的住處，最後一次竟住到理學院地下室去了。廈大校長林文慶也不滿意魯迅提倡「的嗎了」新文學。同年十二月卅一日魯迅向廈大辭去一切職務，應聘中山大學前往廣州任教。

當時中山大學的中共黨總支部爲爭取魯迅南下五羊，乃要求中大當局聘請正在廈大任教的魯迅前來繼郭沫若出任中大文學院長。因郭參加北伐任武職去了。魯迅於一九二七年元月十六日自

(一) 魯迅新傳

廈門乘「蘇州輪」起程，同月十八日船抵廣州，次月即接任中大文學系主任，後又再兼中大教務主任。魯迅在廣州時，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和共青团廣東區委李求實（李偉森）即指定中共中山大學總支書記徐文雅（徐彬如）、中共廣東區委學生運動會副書記畢磊與魯迅聯繫。中共廣東區委並指示中共黨員，要團結和擁護魯迅，要把魯迅當作「自己人」看待。

徐文雅和畢磊經常自動把中共的出版物「嚮導」、「人民月刊」、「少年先鋒」和「做什麼」(What To Do?) (此原為列寧著作之一，中共現重譯為「怎麼辦?」)，定期送請魯迅參考。「少年先鋒」是共青团廣東區委宣傳部(部長李求實)主編的刊物。魯迅在廣州也經常與青年人接近，也接見中共的黨員。據說畢磊還陪同魯迅會見陳延年。一九二七年四月清黨時畢磊被殺，魯迅後來寫了「怎麼寫(夜記之一)」一文來紀念他。魯迅為愛護青年曾設法營救一些被捕的中共黨員。清黨開始不久加以中大人事糾紛，魯迅即於四月二十一日向中山大學辭去一切本兼職務，留在廣州從事編譯，校對舊稿。

魯迅與他的學生許廣平小姐於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自廣州乘「山東」號輪到香港，同年十月三日轉往上海，還把「少年先鋒」帶在身邊。同月五日上海北新書店老板李小峯夫婦即設宴洗塵，同座的有魯迅之弟周建人及郁達夫、潘梓年、孫伏園等。魯迅到上海不久，中共上海地下黨先後派鄭超麟、潘漢年、馮雪峯等與之接觸聯繫。十月八日與許廣平正式共同生活，但未與

原配朱安離婚。自此魯迅便定居上海日本租界，過着優哉游哉的生活，偶或外出他遊，以迄一九三六年十月病逝，整整九年時間住在東方明珠的上海。上海報紙上的社會新聞，對魯迅像是一個無盡的文化寶庫，這是他寫作雜文的主要資料來源。他怎麼也捨不得離開上海。魯迅的作品多以他的童年和故鄉紹興情形為背景。他熟習農民的生活，也只能寫農民。而於工人羣衆未曾直接接近，更不熟習他們的脾氣，無從寫工人的東西。他不熟習的東西，不隨便寫，他的意思不要隨便把什麼作品都叫做無產階級文學。註⑦

從廣州到上海定居的第二年，魯迅就遭遇到一生中最大的敵羣，創造社、太陽社的聯合圍攻。這一次這兩個社團圍剿魯迅的理論，多少受了當時日本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影響。那時國人翻譯介紹蘇聯文藝理論著作，絕大部份是從日文轉譯過來的。

創造社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一九二二年五月創造社先後發行過「創造」季刊、「創造月刊」、「創造週報」、「創造日報」、「洪水」、「流沙」、「日出旬刊」等期刊。創造社員以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為核心，還包括有潘漢年、李一氓、陽翰笙、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王獨清、陶晶荪、穆木天(穆敬熙)等人，但人員大多分散各地，其中有很多人後來實際參加政治工作去了。一九二七年清黨後，有很多中共文藝工作人員，從實際鬭爭的前線潰退到上海。郭沫若、李一氓、陽翰笙等是在南昌暴動後，經潮州、汕頭、香港等地輾轉來到上海。

一九二七年創造社又增添了被迫由日本回來的彭康、李初黎、朱競我、李鐵聲、王學文、傅克與、沈起予、許幸之、沈葉沉等人，但都還不是中共黨員。

太陽社由錢杏邨、蔣光慈、楊邨人、孟超等四人於一九二七年六月在武漢建社，後來擁有中共黨員二十多人。太陽社創辦「太陽月刊」、「時代文藝」、「海風週報」、「新流月報」(後易名「拓荒者」)等期刊。錢杏邨、蔣光慈、孟超等人一九二七年清黨時，經武漢安徽撤退到上海、杜國庠(林伯修)、洪靈菲、戴平萬等是從廣東海陸豐暴動失敗後到上海的。這一羣文化工作者便成了太陽社早期成員。許濂新等也到了上海。杜國庠、柯柏年、許濂新喜歡搞文藝理論，他們幾個人組成了「我們社」，後來成爲左聯組織之一。他們到了上海後住在外國租界也很寂寞，乃辦書店出刊物，一面混過生活，一面做中共黨的地下工作。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魯迅與創造社的人來往很密切。一九二七年十月魯迅到上海，十一月鄭伯奇、蔣光慈曾去看魯迅，商談「創造月刊」復刊事。因此，魯迅曾和麥克昂(郭沫若)具名發表「創造週報」優待訂戶啓事和「創造週報」復活了的出版預告。成仿吾自日本回上海後，激烈反對與魯迅聯合，不贊成「創造週報」復活改出「文化批判」。一九二八年元月「文化批判」一出，魯迅說：「突然攻擊我來了。」魯迅大感意外，反魯迅的主力來自李初黎、彭康、朱競我、馮乃超等人。論戰期中魯迅曾譏成仿吾是「青年

「批評家」、「批評家」、「批評大家」、「元帥」和「司令官」。

創造社和太陽社於一九二八年起提倡「革命文學」，當時又叫做無產階級文學、新興文學、普羅文學，第四階級文學，他們認為魯迅是「革命文學」的障礙而大肆攻擊，指魯迅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革命的旁觀者，是時代的落伍者，魯迅不革命，也不反革命，是小資產階級最良的代言人，對無產階級是一個最兇惡的煽動家。又指魯迅購買社會科學書刊的舉動，只是塗抹彩色。粉飾自己的沒落。創造社和太陽社聯合攻擊魯迅，根據馮雪峯的回憶，可能出自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的行動。那時創造社、太陽社的中共黨員同屬中共上海地下黨開北區第三街道支部，即在中共地下黨文化支部中討論過。註⑧此一支部由中共江蘇省委直接領導。

批評魯迅的文章主要發表在「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日出旬刊」上，也有三言兩語批評魯迅的。在一場論戰中，郭沫若是攻擊魯迅最兇猛的一員大將。一九二八年魯迅的陣地「語絲」雜誌第四卷第十九期上第一二三號「隨感錄」發表了魯迅四月二十日所寫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短文。文中說近日弱水（潘梓年）寫了一篇「談中國現在文學界」指責魯迅的文章「辭鋒太有點尖酸刻薄」，「態度太不與了」，「量氣太窄了」，「適足表出『老頭子』的確不行了」。不但和西澀（陳源筆名。陳源號通信，江蘇無錫人）、長虹（即高長虹，山西孟縣人，狂飈社人員，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認識

魯迅。魯迅不滿意高的作風，高攻擊魯迅。）戰又和創造社戰起來了。魯迅認為其中有一粒子彈是對着他，所以魯迅寫了「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來回敬他們。

杜荃於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在創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發表了他同年六月一日寫的「文藝戰上的封建餘孽——批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一文，說是論戰，郭沫若不過是站在無產階級唯物論的名詞上，作了如下的批評。杜荃說：「大約他是一位過渡時代的遊移份子。他對於舊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已經懷疑，而他對於新的無產階級的意識又沒有確實的把握。所以他的態度是中間的，不革命的——更說進一層他或者不至於反革命。」杜荃讀了魯迅的那篇隨感錄得了三個判斷：「第一、魯迅的時代在資本主義以前，更簡切的說，他還是一個封建餘孽。第二、他連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都不會確實的把握。所以第三、不消說他是根本不了解辯證法的唯物論。」他還根據魯迅的話，作了些引證。杜荃還為魯迅建立了時代性和階級性，說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又說「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因此「魯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 *Utopia*（法西斯諦）！」

杜荃究竟是誰呢？文革期間魯迅真是一具真神，死後還能呼風喚雨。凡是當年參加圍剿魯迅的人，幾乎都成爲中共的罪人，新的牛鬼蛇神，打入十九層地獄。郭沫若曾是當年圍剿魯迅的主

將，便不斷有人向他請教這篇文章的作者杜荃何許人也，這個筆名是不是他自己。郭總以時間太久無從記憶，來搪塞來人滋擾。一九七七年郭已罹絕症住院，次年六月十二日衰老病逝。他死雖然了却一場心病，但對魯迅的那一羣信衆，並不會因郭死而罷休。指魯迅爲「一個封建餘孽」的那篇署名「杜荃」的名著，已證明出自郭沫若的手筆，是郭的又一筆名。註⑨政治是殘酷無情的。在中共的社會中本來就缺少坦白和自由，又把魯迅、毛澤東、列寧、馬克思塑成眞神，頂禮膜拜，三呼九叩，對他們的東西幾乎神聖不可侵犯。世界上任何人任何思想，沒有不能批評的。如果不能、不敢、不准、不可批評，就會有手操這樣權力的人，來腐蝕這個社會，來鎮壓異己，這就是中共社會致亂之根由。郭沫若沒有那麼大的力量能衝破這道人造的腐蝕鐵牆，來爲共產主義運動而犧牲，只好無爲而治道法自法裝裱（他本來就裝）作啞了。

拿現在的標準來看，那一場論戰不能算什麼論戰，因爲雙方發表的文章中說不上有什麼理論爭論，也沒有太多的事實作爲根據，雙方都近於瞎扯。大概三十年代的文藝水準遠不及後來的文藝作品爲高。這一場論戰歷時年餘，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止，待中共上海地下黨出面團結左翼作家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才結束了這一場還未結束的論戰。後來魯迅於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在他的「三閑集」序言中回顧說：「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

中外雜誌

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這一場論戰，魯迅為應戰迫使他讀了一些共產主義運動的書籍，了解了這些著作中一些個別名詞的意義。

註① 北京「晨報副鐫」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創刊，隨北京「晨報」附送，由孫伏園主編。報頭是「晨報副鐫」，報眉為「晨報附刊」。「晨報附刊」為魯迅所命名，因為是隨報附送之

故。

註② 鄧明以：五四時期的陳望道，百科知識，一期，一九七九、五、一，二十九頁。

註③ 抱朴先生訪問記，中國之春，一九八三、九，一九頁。

註④ 關於一九二八年魯迅寫信給任國楨的一些情況，魯迅研究資料，五集，一九八〇、五、一六九、一七〇頁。

註⑤ 紀文：「魯迅全集」未收書簡，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三輯，一九六三

，一—六頁。

註⑥ 戈寶權：魯迅在世界文學上的地位，一九八一，七頁。

註⑦ 馮雪峯：回憶魯迅，一九五七，三十三、三十六頁。

註⑧ 馮雪峯談左聯，新文學史料，一期，一九八〇、二、二十二，二頁。

註⑨ 史索：杜荃是誰，魯迅研究文叢，一輯，一九八〇，九十五至二百一十一頁。

(未完待續)

聖文叢書 俞鴻鈞傳 隆重出版

王紹齋著 章君毅著 平裝新臺幣一八〇元 精裝新臺幣二八〇元

本書係王紹齋、章君毅先生合著，要目有：活字典來自聖約翰，感化同窗成為名師，大學生活交女朋友，意外事件促成良緣，夫人出馬獲得加薪，參譯國民大會宣言，陳友仁的得力助手，主持收回漢英租界，唾棄共黨辭官回滬，識周雍能相知甚深，初任上海市府秘書，代理財政局長，主持上海市預算，市府秘書解決風潮，週旋暴日嶄露頭角，嚴正態度戲弄巴敦，身入虎穴先聲奪人，當眾宣佈廢止協定，設後援會支援前線，上海撤守猶有佈置，香港總督份外尊重，代孔祥熙上參政會，整飭官方清除權貴，一舉擢升財政部長，大陸撤守黃金運臺，任臺灣省主席，解決糧荒緊急措施，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膺命組閣崇法務實，四年任內政績斐然，監委彈劾軒然大波，奉行命令拒絕查帳，蔣公致詞語多沉痛，雲散霧收雨過天青，四壁圖書高與屋齊，院長官邸小得可憐，公餘之暇手不釋卷，生前辛勞死後哀榮，內容精彩，百讀不厭。二十五開本，二百八十頁。平裝本定價新臺幣一百八十元，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中外雜誌社帳戶。